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及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

黄小同 李德福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及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一文旨在根据已掌握的国内外大量史料，论述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天津已经建有早期共产党组织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并进一步阐述了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首先指出，进入 20 世纪以来，天津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深入传播，天津早期进步团体的建立，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还指出了苏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给予的重要指导和帮助。

文章最后认为，天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工作中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以周恩来、张太雷为代表的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共创建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及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只有上海、北京、济南、武汉、广州、长沙建立过早期共产党组织（通称共产主义小组），并对中共创建起到过决定性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①。在这里，我们向党史界提出一个新的认识，即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天津也建有早期共产党组织，她同样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一、天津完全具备产生早期党组织的条件

研究探讨天津早期党组织能否存在，首先必须研究天津具备不具备产生早期共

^①马思恩《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产党组织的条件。党史界认为，中共“一大”前，产生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一般应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这些地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发展迅速，且富有革命斗争传统；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特别经过五四运动这些地区产生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活动；三是苏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指导和帮助。我们认为天津完全具备上述条件。

1、天津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天津是北方近代工业中心，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生产集中地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并逐渐成为北方贸易大港和近代工商业大城市。

天津近代无产阶级的产生是伴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洋务运动开始的，比资产阶级早二三十年。1860年后帝国主义为便于对中国的土特产品进行掠夺，在天津设立了打包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后来又陆续开办了印刷、轻工、制砖和各种公用事业等企业。在这里，天津最早产业工人出现了。洋务运动开始后，举国闻名的大型工矿企业先后在天津建立，使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基地，工人阶级队伍随之发展起来。天津机器局最盛时有2700多名工人^①。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有600余名工人，天津电报局、铁路公司也拥有相当一批产业工人，开平煤矿开采后又有近4600名工人出现。到甲午战争前，天津不但出现了中国北方，乃至亚洲最大的近代兵工厂，而且成为全国铁路电报中心。据统计，这时全国各种近代工矿企业雇佣工人总数近10万人，其中天津8000余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8%^②。事实上，当时天津工人数量要高于这个统计。

天津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天津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甲午战争前，天津民族工业逐渐发展，到20世纪初已居全国第四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天津民族工业飞速发展，与战前相比，厂数增加了135%，资本总额增加693%，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到1921年前后，天津产业工人和其他工人总数约有10万余人，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他们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强烈要求。天津工人阶级从它出现那天开始，就为自己的生存和民主权利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19世纪末，开平煤矿矿工曾两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首次显示出天津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能力。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天津工人勇敢地加入斗争行列，当时搬运工人拒绝装卸美国货物；印刷工人拒印美商广告；铁路工人发表公告，号召“凡我铁路、电报及车务、工程人等”应尽“国民义务”，“务宜心心相应，协力抵制”^③。1916年10月，当法帝国主义决定武装侵占天津老西开消息传出后，天津各界人民激愤异常，连日示威。11月中旬，天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工人统一领导自动组织起“罢工团”，下设文牍、会计、招待、调查、庶务、稽查、演说7个部，组织极为严密，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它标志着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首次由自发、分散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有联合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同时也初步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

①《津门杂记·卷中·机器局》。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

③《时报》，1905年8月4日。

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纪律性及其团结互助、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天津工人阶级的成熟在五四运动中反映得更为充分，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庸赘述。总之，天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在发展为自为，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2.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深入传播，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真理”。①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旧政权，建立工农政权的壮举，震撼了世界，也在天津进步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了波澜。曾在天津读书6年与天津有着密切联系的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在《言治》和《新青年》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通过天津北洋法政学校、北洋大学、南开中学和天津中华书局在天津进步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刚刚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赴日学习的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里，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被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溆小岑后来回忆说：读了李大钊文章后，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出现第二个列宁，组织工人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胜利。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还亲自翻译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深入学习有关苏俄革命的内容。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开来。尽管当时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竞相传入，但《新青年》杂志，特别是该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书刊，最受天津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周恩来回忆说：“到法国去以前，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考斯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的译本，这些书是《新青年》杂志主持出版的”②。此外，《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晨报》上都刊登许多介绍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及其思想的文章，也对天津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深深感到：这些“介绍世界潮流的名著”，“实在是思想革命的利器”，是“中国前途一线的曙光”③。

这期间，天津许多进步刊物都发表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南开日刊》曾先后刊载了《思想革命》、《中国劳动家庭该怎样去做》、《青年思想根本的改造》、《布尔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劳动时间的主张》等文章，鲜明地提出：要有新国家、新政治、新道德、新学术、新生命、新青年，“必先要有新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从根本上革新的锐利武器”④。文章还结合天津工人阶级的现状，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其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思想的主张，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②斯诺《周恩来早年生活》，香港万源图书公司出版的《周恩来传记》1976年版。

③王健起《思想革命》，载《南开日刊》第60期。

④章志《青年思想的根本改造》，载《南开日刊》第41期，1919年7月19日。

在正求解放中国”的人们^①。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方面,《南开校风》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将来中国必经的阶段”^②。天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七十多年前就能提出这一认识,应该说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与此同时,觉悟社的《觉悟》杂志,新生社的《新生》杂志,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办的《平民杂志》,北洋大学的《北洋日报》,直隶第一女师的《醒世周刊》也都把研究各种新思潮,讨论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改造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周恩来等就是杰出的代表。1920年初,当他同一批反帝爱国运动骨干被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当时能够这样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在全国也是罕见的。1921年初,周恩来在给天津觉悟社社员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它为它宣传奔走。”^③则完全代表了当时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深入传播,已为建立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

3. 天津进步团体的建立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做了组织准备。

十月革命后,特别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出现了一批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不仅团结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而且得到李大钊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从而为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保证。

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天津南开中学和法政专门学校部分学生建立了新中学会。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又在天津吸收会员,当时曾“酝酿过两会合并问题”,后“决定两会结为友会”。五四运动初期,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成为全市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领导部门。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张太雷、官立中学于方舟,刚从日本归来的周恩来以及刘清扬等,也时常到“北京大学联系学生会工作”,“和李大钊先生之间常有往来”^④。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这批先进分子深深体会到,在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形式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一般组织阶段,还应选择更先进分子,组成更严密的领导团体,使之成为巩固、持久的对敌“作战的大本营”,“引导社会的先锋。”1919年9月以周恩来为首的20名先进青年率先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觉悟社。觉悟社以革新、革心为宗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⑤。在思想方向上,觉悟社强调适应“现代觉悟的潮流”,渴望“实现一个没有阶

①《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第63号。

②杨维宪《社会主义与中国》,载《南开校风》。

③周恩来《伍的誓词》,载《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⑤《觉悟的宣言》,载《觉悟》第一期。

织的社会”；在组织上，觉悟社“对于新加入的社员取严格的主义——规定‘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并经认真审查是否具备‘奋斗、牺牲’、‘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经全体社员讨论同意后才能吸收；在内部生活中，开展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社内组织采取委员制’^①，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体现了民主集中的原则，这些原则和措施的贯彻实施，使天津先进分子在思想、组织、内部生活诸方面获得了建立革命核心组织所需要的启蒙知识和基本训练，这就为天津先进分子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觉悟社成立后，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继觉悟社之后，在李大钊影响下，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等又组织了“全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新生社。1920年3月，李大钊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后，天津一批先进分子如张太雷、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先后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员，这对张太雷等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21年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曾高度评价了“觉悟社”等早期进步团体，认为他们的活动已“成了全民族的运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论及中国共产党产生背景时，更明确指出“天津觉悟社”、“新生社”，尽管还“不都是纯粹共产主义的组织，但都是一步一步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此时尚无全国组织，但已在萌芽时代了”^②。无疑，这“萌芽”就是指“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萌芽，也正是由于觉悟社、新生社这样组织的建立，才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马克思认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③。当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广泛深入传播时，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李大钊引导下积极与工农相结合，在工人运动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时，觉悟社已经开始讨论“在学生运动以后，要从事工人运动”^④问题。以周恩来、张太雷等为代表的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卅运动后，积极走向社会开办平民夜学校、国民半日学校、工人星期日学校，学徒义务学校、工厂补习学校，人力车夫休息处等，并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始组织天津的码头工人”^⑤，向劳苦大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南开大学数十人还奔赴津郊各地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同年8月，觉悟社进一步提出要联合进步团体，开展农工运动。这一主张立即得到李大钊的充分肯定。在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的联席会上，李大钊强调指出各团体首先要确定共同的明确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同时要依靠工农阶级变革社会。会后，在觉悟社等组织

①同上。

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9页。

④张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带动下，在天津进步青年中很快兴起了“从事社会实况之调查”和“农工组织之运动”的热潮。

俄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在天津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俄两国人民就建立了革命联系，十月革命以后，这种革命联系更加紧密。1919年初，列宁亲自创建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十分关注，共产国际“一大”特别邀请了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参加，会议期间列宁亲切接见了他们。由于当时俄国国内战争仍在进行，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还未停止，在中俄交通断绝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只好委托苏俄东部地区的共产党员和旅俄华侨左翼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的代表建立联系，他们认为准确及时地将苏俄的革命进程“通报给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情报宣传局，并规定其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同他们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书面和口头宣传……”。^①此后，俄共（布）的代表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接触。当时，天津尚有旧俄租界，这就为苏俄共产党人提供了很好的隐蔽的活动场所。据有关史料记载，1919年前后，来华的俄国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有鲍立维、缪勒、布尔特曼、斯托扬诺维奇等，他们都住在天津旧俄租界，秘密从事推动中国革命的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共产国际“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②决定派人“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③不久，俄共（布）老党员，后来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任的布尔特曼从海参崴来到天津并会见了李大钊，很快俄共党员缪勒也来到天津，同布尔特曼一道经常与李大钊接触，并且“在天津和北京联合学生和教授，散播共党思想，介绍列宁的文章”^④。缪勒回忆“布尔特曼甚至在我到达之前就已经和北京、天津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在1919年9月与布尔特曼会面时，这些关系依然保持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又一个的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由此可见，天津进步团体与俄国共产党人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学习苏俄，探索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缪勒、布尔特曼等还向天津先进分子讲解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著作，还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同时还启发天津革命知识分子“必须与天津的纺织和码头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要着手组织当时还没有的工会。”而这也正是当时布尔特曼“与李大钊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⑤。就在觉悟社成立之前，周恩来等人曾会见鲍立维，讨论了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在历史上的

①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若干问题》，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第64页。

②李达《七一回忆》，载《七一》创刊号，1958年版。

③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

④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⑤同上。

地位和作用问题^①。1920年夏秋之际，张太雷与鲍立维在天津还进一步开展了对京奉铁路工人、唐山机丰车辆厂以及煤矿工人和启新洋灰工人的组织工作，与邓培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上述情况表明，天津的先进分子在1919年底至1920年期间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开始实践“走俄国人的路”，这就使天津的共产主义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20年10月，张太雷在天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标志着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1920年上海、北京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底以前，天津共产党组织在张太雷的主持下正式建立起来，并在唐山站设立了分部。从有关史料分析，天津早期党组织成员除张太雷以外还可能邓培、吴南如、姜殿若、郑德等。关于天津早期党组织的情况在1921年6月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有明确记载：“……截至今年五月一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城地方党组织”，即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东、香港、南京。关于天津党组织，报告作了如下表述：“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上这个最大车站的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最大工业中心^②京奉铁路各修配厂共有2500名工人；^③启新水泥厂有200名工人；^④开滦煤矿公司的矿山有1400名工人。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开办工厂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工会的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们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关的工会”^⑤。

张太雷的报告不仅无庸置疑地说明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天津有早期共产党组织，而且还反映出了该组织活动的阶级基础。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活动的新的重大发现，应该引起党史界的高度重视。

多年来，阐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与发展没有涉及天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文字资料。然而我们留心收集资料，还是发现有不少散见的文字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一大”召开前，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存在与活动的痕迹，如：1920年初，李大钊同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旧俄租界会见俄国共产党人，据当事者回忆“李（大钊）、姜（殿若）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章志）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⑥。姜殿若后来又回忆说：“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同志发起的”^⑦。显然他们是研究在天津和北京建立共产党问题。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时，也曾表示在北方“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⑧。为配合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由俄共（布）中央领导的俄国共产华员局也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工业无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活动，以实现其“组织中国工人阶级”的宗旨^⑨。中共

① 齐世文斯基《周恩来与苏联》，载《中外学者谈周恩来》第14页。

②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文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章志1959年回忆，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④ 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⑥ 米镇波《俄共（布）所属旅俄华共党组织及其活动（1918—1922年）》，载《南开学报》1989年4月。

“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早期建党时说“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处”^①。另一名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写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大会代表12人，代表7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②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与张太雷共同工作过的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于1928年撰文指出“张太雷同志在1920年底，即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已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积极地参加了上海、北京、天津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③而且天津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曾于1921年1月派代表参加了由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党组织会议^④。另据缪勒回忆，1921年1月初当他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4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⑤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所阐述的党的基本任务极为吻合，因而我们认为1920年底以前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已经产生，并按照党的决议正在积极工作。

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为什么没有象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那样存在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后赴法勤工俭学或到共产国际工作，使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缺乏中坚人才和后备力量。1920年11月在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中，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如觉悟社主要成员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等抱着进一步探讨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前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资本主义腹地的西欧勤工俭学，这就在客观上减少了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尽管他们在国外与天津的先进分子时常有信件往来，但其影响和推动力显然不如以前了。1921年春作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张太雷又因共产国际工作的需要被调离天津，到远东局任中国科书记，使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失去了得力的领导者。此后，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吴南如和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些骨干成员也先后赴法勤工俭学或到外地工作，因而使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出现“暂时停顿现象”。

其二、早期共产党组织成份复杂，信仰不一，影响了天津党组织的发展。五四运动前后，当各种“新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时，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想也都作为“社会主义”学说广为流传，其中有些代表人物也参加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加入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如天津早期党组织成员姜殿若即是积极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走无政府主义道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做法，便成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尖锐矛盾。显然，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了中国党组织的发展障碍，正如张太雷1921年6月所说，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工作，——我们力图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

①包惠僧1953年9月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②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③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历史和共产党史片断》，载《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版。

④苏联《红旗报》1921年1月17日。

⑤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3月版。

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我们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还制定了临时纲领”^①。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内部曾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除”工作，以便建立“纯粹”的共产党组织。事实是，在这一斗争中，不少人被清除，或退出了共产党。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天津早期党组织在成员减少的情况下，未能象上海、北京党组织那样及时发展新党员，加之又缺乏骨干成员，因而影响了自身组织的发展，活动停止，这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京津两地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一体，使天津党组织未能继续独立的发展。京津近在咫尺，自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革命活动方面相互影响，相互策应，相互支持。特别是在李大钊的统一领导下，京津两地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是同步发展，两地革命知识分子经常串联、相互学习、共同行动。周恩来领导觉悟社与北京革命社团联合行动；张太雷、于方舟等参加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张太雷等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京津两地党的工作很快形成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划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由李大钊统一领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三、天津早期党组织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作用及影响。

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所从事的上述活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天津是共产国际对华活动的秘密通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靠近北京，濒临海港，地处津浦、京奉铁路交汇点，又有海河，水陆交通发达，其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再加上租界林立，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因而天津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国际在华开展工作的重要通道和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活动最早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19年2月在北洋政府的一份文件中就这样写道：“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机关，行动诡密”。此后，在天津警察厅的档案中有许多“过激派传单”自天津邮寄各地以及天津与北京、上海等地联系密切的记载^②。另据黄凌霜回忆“当露国（俄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一九一九年旅俄六周见闻记》足下曾为余谈稿，想当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通讯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③。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回上海，在来天津的途中，俩人两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也正是在这次商谈后，李大钊同天津先进分子与苏俄共产党人研究了在

①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文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

③北京《晨报》副刊1919年11月12日，1920年1月7日。

天津、北京建立共产党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后，从哈尔滨直接到天津，并以天津为中心，北上北京，南下上海，“帮助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通过当地共产党人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阶级的工人工会，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思想”。在李大钊及天津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帮助下，苏联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代表推进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工作进展顺利。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

1921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北京分部会议，天津党组织代表出席了该会，并在会上提出了“联合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党组织”，“形成中央机构，以便更顺利地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运动”^①的重要建议。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远见卓识，无疑对推动全国形成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是一大贡献。

2.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极为重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现有资料证明，天津是继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第二个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都市。张太雷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及主要负责人。在他主持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明确宣布自己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组织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研究社会主义，开展政治斗争。尽管从章程上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按照联合不同社会成份（除工人外，还有学生、店员等）的原则组成，但实际仍以工人为主，另外当时天津的团组织“已经建立起较为严整和固定的组织机构：即有“类似委员会的书记处”；有“特别的全权代表制的小组”的基层组织；还有“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和“社会主义研究部”，以及定期的组织活动，对于吸收和开除其成员也都有明确的规定。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地方组织的章程，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团章，和当时其他一些地区的团章相比较，它没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痕迹，明确而完备，在当时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加上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工作，深入工人，被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负责人称为“贯彻始终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②。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天津团组织成员还在李大钊、张太雷的具体领导下，深入到长辛店、南口、唐山以及京奉、津浦、京汉铁路沿线工人集中地区活动，并于1921年1月4日出版了《未报》（英文“劳动”一词的谐音），同时与西南地区、汉口、河南等地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可见，当时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天津的范围，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斗争中，才壮大了无产阶级力量，培养锻炼了一批共产主义者。正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所讲“这是因为在这个运动中，纯粹的无产阶级成份已经开始出现并且茁壮成长”，早期团组织在运动中所起的是“战士的积极作用”^③。

①苏联《红旗报》1921年1月17日。

②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青年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载《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③同上

3. 以周恩来、张太雷为代表的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众所周知，周恩来、张太雷的青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和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以及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活动都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活动已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界上发生许多文化团体的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天津觉悟社就是其中之一^①。觉悟社所创办的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推动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上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周恩来等人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他们对工人运动的认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此已有不少文章专门论述，笔者不再赘述。正因为天津觉悟社“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也就更应该充分认识周恩来等人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

对于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建者张太雷，多年来党史学界一致认为他是我党的政治活动家，是中共早期党员，而对他任中共早期创建中的作用，似乎认识不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张太雷不仅与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张太雷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最早与苏俄共产党人接触，并直接参与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早在1918年鲍立维到天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时，正在北洋大学学习的张太雷就为其做英文翻译，“于每日自修时间中秘密翻译社会主义革命文献”，这样使他较早地直接接触到了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有关文件，应该承认，这对坚定张太雷“走俄国人的路”思想的形成是有重要意义的。五四运动后，张太雷开始与李钊密切往来，在李大钊与鲍立维等苏俄共产党人的相识和频繁接触过程中，张太雷起到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1920年，他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即为革命奔走，常常带着秘密翻译的社会主义文献和宣传斗争小册子往来京津之间。到京时，即往访邓中夏或张国焘，有时瞿秋白同来，往访李守常”^②。实际上，此时张太雷已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和苏俄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职业革命者了。他经常活动于京、津、长辛店、唐山等地，来往于李大钊等一批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以至直接从事建立共产党的革命者之间，对加强苏俄共产党人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沟通京、津等地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联络员作用。同年春，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又给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翻译。由于维经斯基一行的主要使命是帮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筹建共产党组织，因此，张太雷也就全力投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他随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又同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直接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同年秋，他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③。10月末，他在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书记。是年底以前，天津共产党组织建立。尽管我们现在对张太雷参与上海建党、建团，参加北京共产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②李子宜《追忆学生时期的张太雷》，载《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王一知《回忆太雷》，载《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党小组，以及建立天津共产党组织的许多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甚至对张太雷是上海的党员^①，还是北京的党员，或者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特殊党员还考证不清。但张太雷在1920年期间频繁奔走于京、津、沪，直接推动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建立的事实却已留下了历史痕迹，虽然这条痕迹并不十分清晰，但历史事实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中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联络作用，以及他在推动和参与京、津、沪等地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工作中的杰出表现，1921年1月，当共产国际决定建立远东局时，张太雷才在中共还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

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所从事早期建党、建团的实践活动，还表现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贡献方面：

第一，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强大的工会组织。这在张太雷所起草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中已清楚地反映出来。当时以张太雷为首的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经验的同时，深入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中国的工人运动，提出了工人要组织起产业类型的纯阶级的工人联合会，以代替建立在行会和同业公会基础上的那些联合会。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中国工人运动的弱点，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发挥其独立性和独立自主地进行阶级斗争^②。这一思想认识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精髓，为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现状，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1921年3月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的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这种自发运动（指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笔者）具有革命斗争的因素”，以便汇成中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洪流。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联合成强大的阶级组织，把一切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人集中，——使他们成为一支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很明显，张太雷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从上述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阶级基础、基本任务、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认识已趋向成熟，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承认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在中共创建理论上的贡献，特别是在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党的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1921年以前，天津已经完全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阶级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和组织条件。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天津工人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运动的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2月21日。

^② 《工人世界》1920年9月号，载《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深入开展：李大钊的指导及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工作；苏联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一大”召开前，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及其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引起党史界的高度重视，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

当然，关于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许多内在情况，我们目前还缺乏了解，历史上往往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由于文字记载缺乏，却无法呈现其本来面目。今天，我们提出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存在问题，并予以初步论述，意在表明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整个创建时期的相关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资料，研究探讨，这也正是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